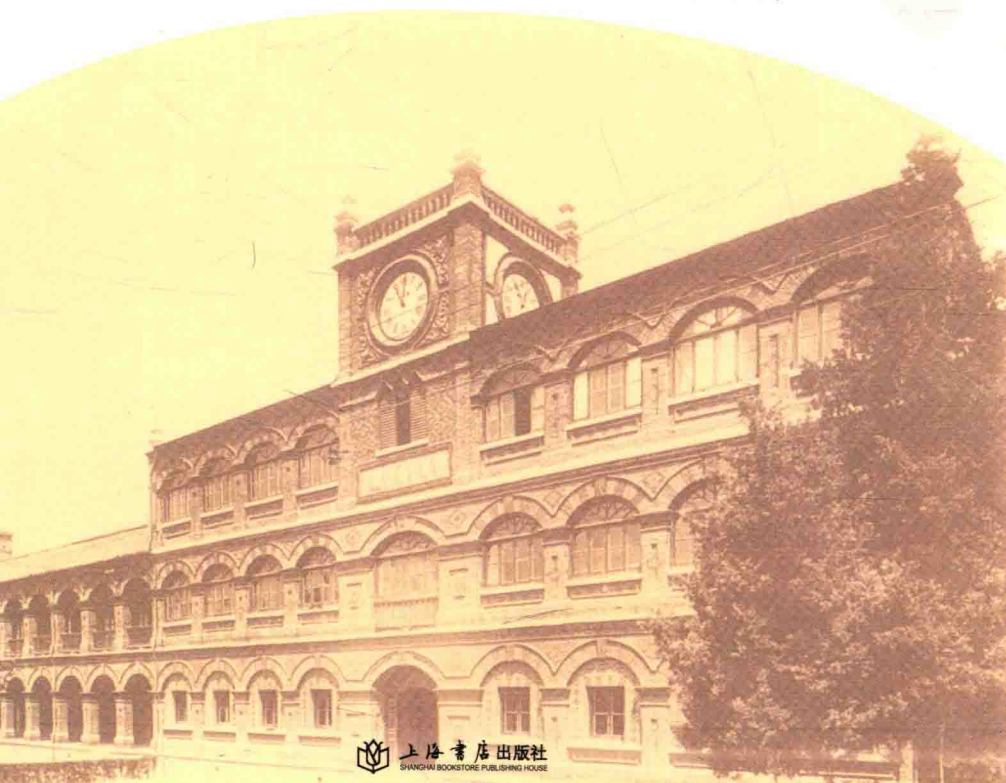


# 体国经世

民国的学人与商人

蒋宝麟 著



# 体国经世

## 民国的学人与商人

蒋宝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国经世:民国的学人与商人/蒋宝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458-1142-1

I. ①体… II. ①蒋… III. ①社会科学-科学工作者-  
人物研究-中国-民国②商人-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K825.1②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2707 号



体国经世:民国的学人与商人

蒋宝麟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60,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42-1/K · 194  
定 价 35.00 元

本书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  
(2014T70497) 资助

## 前 言

清季科举废除,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被打破。进入民国之后,传统“士人”渐渐隐去,而受过新式教育的“学人”成为中西知识的传承者。近代中国“学人”,或与彼时言说及当下研究中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智识阶级”等指称涵义相近。不过,相较其他称谓,“学人”更接近历史语境,涵盖面更广。2014年7月,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名为“近代中国转型中的学人与社会”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主题包括“传统士人”、“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与“大学教授”等各类身份有叠加的知识群体。这大概能反映当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学人”概念在接受情况。

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士人与学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和生活方式,而“学”则更倾向于单纯的社会职业属性。孔子提出的“士志于道”,是古代士人读书致仕的一般法则。章学诚尝言:“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sup>[1]</sup>在传统政教相连的体制中,士人以“学”追求“道”,即可平公私畛域。有论者指出,在近代中国的“过渡社会”,学人(读书人)始终徘徊在读书和社会责任之间。很多读书人却希望做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但在近代中国的多事之秋,他们中的少数直接参与政治,多数则不时参与议政。<sup>[2]</sup>按近代西方政治学的标准,学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2] 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人应秉持的学术(知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法则,在民国时期渐成学术界的主流观念。但近代学人对于“道”不同形式的追寻,一直贯穿民国历史始终,也是民国政治的一份重要遗产。用钱穆的话讲,辛亥之后的知识界四十年间对于向新向西的努力,“抵不过二千年的潜存文化”,四十年间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sup>[1]</sup>

在传统的“耕读仕进”模式消解之后,民国学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大致有三:一是参加“革命”<sup>[2]</sup>,最终成为职业革命者或革命家;二是凭藉专业知识技术或依托社会网络进入体制为官,或在政府和学界中进退自如,隐显往返;三是通过新式的社会渠道,尤其是新式公共媒体评议政治。除此之外,民国学人参与政治的另一重要方式是加入政府的社会建设运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乡村建设运动”。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局势较前相对承平,国内建设问题开始逐渐成为朝野上下广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乡村建设运动随之兴起。乡村建设运动由政府 and 学人共同推动,在部分地区由学人团体在政府设定的“实验县”中从事农村建设活动并掌握县政,此可算作学人社会责任的具体落实。这种尝试或可用近代中国的“第三领域”来理解<sup>[3]</sup>,体现国家将公共事务开放给“社会”和在野的学人的取向。本书的前三章与此主题有关。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当前一个热门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也较充分。从现代史学分科治学的角度看,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可以归入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专门史领域。除了乡村建设运动史实的

[1]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72页。

[2] 此专指“政治革命”或“武力革命”,而更广义的革命,是民国读书人普遍的追求。见罗志田:《土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收入《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104—141页。

[3]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8—276页。

重新梳理之外,还应注意的是,在这一场运动进行的同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伴随而来。然而,学界至今对于这场论争的研讨似乎尚少得见,相关研究也多将注意力停留在几方言论的概念层面和观念的对立冲突之上,而对于论争的史实重建和时代语境中各方观念的异同与互渗,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关怀所指,则少有述及。可以说,这些“论战”本身也是乡建运动这一历史文本的组成部分,这应得到充分重视。

彼时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的论战,显示持不同政治和学术立场的学人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性质,乃至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见解。虽然,他们在思想观念上有根本性差异,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者亦有不少相近之处。如果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问题式”(Problematic)概念<sup>[1]</sup>,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论战两造的思想观念虽有极大的差别,但基本在表述时持有相同的“问题式”(统摄思想理论生产的方式),即对于中国的乡村问题的认知出于外来思想资源和范式,革命化逻辑成为普遍存在的观念,而遭遇本土的现实问题时即出现了歧异的“解决”方法,但解决方法又都必须是“根本”的。

在民国时期,普通学人遍议“国是”,然其中绝大多数终无法厕身其间。相形之下,乡村建设不仅是学人“议政”的对象,而且可以成为“参政”所在。不过,这一实践并不算成功。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总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典型,其“政教合一”模式在当时颇受瞩目。不过,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治和学术颇难合流。或许,对于当代农村建设而言,“定县实验”在有意无意间被塑造成一段逝去的“神话”。其作为“三农问题”的历史资源和历史记忆,再次

[1]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69, pp. 253-254.

被挖掘和激发。故事可以被重复讲述,但反本方可开新,历史本事仍有待详审。

清季十年朝廷实行“新政”,各级新式学堂遍地开花。至民国初年,西式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已根植于各通都大邑。毫无疑问,大学是一大部分民国学人的养成所和职场。同时,大学校园是学人参与政治的重要空间。用通行的知识社会学的术语讲,大学也是一个“权力场域”。<sup>[1]</sup>尽管“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是大学立校的“理想”原则,但在近代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此等范型却从来未能造就。

必须承认,“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与政治干预的颀颀使近代中国大学陷于尴尬而又无奈的境遇。不过,“学术与政治”一般体现知识分子的视角和话语,应该还存在另一个视角——“党国”视角,和另一套话语——“国家教育与大学”。如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名义上成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后,在其言论中(未必付诸实施)所体现的是教育理论上的意识形态化和教化,而在实践经验上是仿效黄埔军校和干部培训学校模式。蒋在黄埔军校的校长经历和师生关系政治化带来的实效,构成他对学校和教育的切身体会。

抗战八年间,中央大学发生过四次校长更替。广义而言,几任校长罗家伦、顾孟余、朱经农(教育长)、顾毓琇和吴有训均为学人,至少是出身学人。但他们之中除了吴有训,均在国民党体制之内,曾任或现任党职官职。战时中大历次“易长”风波,从“党国”层面来讲,战时政治权力对教育文化的渗透逐步加强。不过,“学术”一方的话语权应全面考量,而不是仅关注知识界和大学如何拒斥政治力量。当时,师生们真正排斥的不是政治力量,而是“某一种”特定的政治力

[1] [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量。他们是大学中的“普通学人”，其对大学校长人选的态度，表明政治象征上的“中央化”和实际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有时并不冲突。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大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应充分顾及以上两种立场、视角、话语和经验的碰撞。以当下眼光视之极不正常和极难理解之处，或许在历史语境中正有其“合理”之处。

根据办学主体和教育经费配置方式的不同，近代中国的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分为“公立”（“国立”及“省立”）和“私立”（国人自办和教会创办<sup>[1]</sup>）两类。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的办学主体是私人或是私法人，位于上海的大同大学即属于后者。该校由一个纯粹的民间学人团体——立达学社创办。本书考察此大学和此学人团体，为学人和大学关系的研究增添一个新视角。立达学社在大同大学内确立了自身的权力和制度，但又不得不与国家和社会发生交涉。

“商人”是本书的第二个主题。不似“士”，从传统社会到清末民国，作为职业和身份的“商”延续不辍，并日益发挥出超出其本职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学界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商人，按政治和职业分类标准，有资本家（大资本家、民族资本家）、买办、企业家、金融家（银行家）和工商业者等若干种称谓。刘鸿生，若依其财富标准和解放前与国民党的关系，可归于“大资本家”之列，据1956年新中国政府的统计，刘家是仅次于荣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最富有的企业家族<sup>[2]</sup>；如按其在1949年后的政治抉择和在“工商业改造”时的政治表现，又可算作“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由煤炭业买办出身，从1920年代初起在多个工业领域发力，迅速建立起刘氏企业帝国，是那个时代名副其

[1] 因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自成体系，且时人指称的“私立大学”一般多指称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故本书所研讨的“私立大学”专指后者。

[2] [美]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程麟荪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实的上海滩头号企业家。他不仅投资金融领域，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小型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他还担任过经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的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抗战时期任重庆国民政府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战后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从以上经历和头衔来看，刘鸿生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但他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刘鸿生无疑可以归入“政商”之列<sup>[1]</sup>，不过，“政商”二字仍应作偏正词理解，他首先是个商人，为谋求和维系其经营利益的商人。我对民国时期商人尚无整体认识，宏观研究亦力所不逮，现以刘鸿生为个案姑妄言之。

本书的最后两则故事，讲的是抗战时期的刘鸿生，从战端爆发之初的疑惧和首鼠两端，到在大后方当“小伙计”，用少量的资本和设备技术进行新一轮的经营扩张，并担任官员，由此可清晰得见刘鸿生从上海到重庆的事业和政治履迹。同时，刘鸿生和刘家又绝不放弃在上海的产业，与日方虚与委蛇，政治立场很是暧昧。在那段时间中，刘家在上海的事业并未凋零，仍有一定发展。从这层意义而言，刘鸿生的经营和政治身份又是在上海和重庆之间摇摆，试图两不得罪，两头受益。简言之，在这一特殊时期，他的政治安排决定了他的事业走向，他的事业又深深卷入政治之中。作为商人，他无力改变政治，但能巧妙地利用政治以趋利避害。或许，和他一样的“政商”，遭遇政治时所做的判断和行为因应是复杂又多面的，他们在动用各种政治资源的同时，也有各种无可奈何。

---

[1] 关于近代中国“政商”的研究，参见冯筱才：《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作者没有明确给出该书所使用“政商”的定义，结论提及“‘政商’的‘政’不但是指官员，或政府，而包括公共政治，甚至党派政治，以及种种新式政治技术的运用”（第251页），结合全书内容，政商应指能动用较大的各种政治资源为其经营盈利服务的商人。

在近十年之中，我较多关注民国时期的学人与商人这两个群体，希望藉此加深自己对民国史的理解。本书大部分篇章曾在海内外期刊或论文集发表，现修改整合结集，期望从不同视角和断面对略嫌宏大的历史主题做些诠释的工夫，尽管自己的学识与学力均极有限。本书的系列研究得以完成并呈现，需要感谢太多的师友，恕我不再一一感谢。但在自己的第一本小书里头，我谨向带我登堂入室，手把手地教我查史料、写文章的导师王瑞成教授、李玉教授与梁元生教授致以由衷谢忱！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成现在这个模样。是他们促我养成潜心文学的态度，让我始知何谓“学术理想”。他们完全宽容了我的无知无畏与鲁莽愚钝。“远路不须愁日暮”，惟愿今后不辱师教！

这十年之中，祖父、祖母相继离世，至今慈容仍常在我梦里依稀得见。本书完成之际，恰逢小儿修谙降生，看着他毫无介意的瞋笑，曾祖在天国那边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于是我开始相信传承的力量。虽然世代的样貌会更易，但一定有一些根本性的生命密码流淌在血管之中不会改变。家族代际如是，学术延续亦如是否？

# 目 录

## 前 言 ---1

## 第一章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19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 一、从“乡村崩溃”到“乡村建设” ---2
- 二、“帝国主义”：共同的思想资源与歧异的“解决”道路 ---7
- 三、“封建主义”：外来思想范式的引入与现实条件的限制 ---16

## 第二章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中西新旧”问题

- 一、历史语境中的革命性批判与“乡村建设运动评价史”的形成 ---24
-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与过去：时代语境中的农村西化 / 现代化 ---27
- 三、底层的声音：乡建运动重构乡村权力结构的“新”与“旧” ---34

## 第三章 晏阳初“定县实验”的“政教合一”模式及其悖论

- 一、定县乡村建设的深入及其困境 ---41
- 二、“学术与政治合流” ---43
- 三、“政教合一”背景下的学人团体、乡村社会与地方政治 ---47

## 第四章 国家与大学政治文化：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易长”研究

- 一、“经费”、“纪纲”与罗家伦的离职 ---62

二、国民党派系政治与“学术自由”的谗论性互动：顾孟余的继任与离任 ---70

三、从“最高领袖”到“知名学者”：蒋介石、顾毓琇和吴有训的先后长校 ---77

## 第五章 学人社团、校董会与私立大同大学的治理机制

一、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的创办 ---89

二、校董会、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治理结构之表里 ---93

三、立达学社对大同大学经费的运作 ---99

## 第六章 从买办到华商企业家：刘鸿生煤炭经销策略

一、刘鸿生的买办业务 ---109

二、与煤号的合作和发展码头堆栈业 ---112

三、从买办到“合作者”和独立经营者 ---116

## 第七章 “有限内迁”与经营扩张：

###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刘鸿生企业

一、抗战初期刘鸿生对战局的因应 ---124

二、过渡渠道：刘鸿生在香港的投资 ---127

三、刘氏企业资本与技术的内迁和新企业的兴建 ---130

四、从官商合办到“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刘氏经营企业中的国家资本 ---137

五、余论 ---143

## 第八章 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刘鸿生企业

### 及其与日方的“有限合作”

- 一、由军管到“中日合办”：大中华火柴公司和章华毛纺织公司 ---150
- 二、由军管到“租赁”：华商上海水泥公司 ---157
- 三、“有限合作”的政治经济学 ---159

## 第一章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19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对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并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这场社会运动发展历程与兴衰成败的论著。<sup>[1]</sup>但应注意的是,在这一场运动进行的同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伴随而来。然而,学界至今对于这场论争的研讨似乎尚少得见,相关的研究也多将注意力停留在几方言论的概念层面和观念的对立冲突之上,而对于论争的史实重建和时代语境中各方观念的异同与互渗,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关怀所指,则少有述及。<sup>[2]</sup>

19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这场论争贯穿了整个运动

---

[1] 郑大华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还有,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金铮:《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10期;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等。海外中国学界对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如Hayford Charles,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Y. C. James Yen and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73, 1990年出版专著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美国学者艾恺对左派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的批判有过概略性的论述。参见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第193—195页,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但许多既存研究往往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少研究者虽未直接以这场论争为研究对象,却在研究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间介入了昔年的这场论争,先有价值预设,或援引论争某一方的言说以“当下眼光”反观乡建运动,以发现这场运动的缺漏与失败的根源。因此,许多研究者往往在事实上既成为论争中的一方,又兼“裁判”之职。

的始终,且余绪不断。纵观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状况,可以发现从事该项工作的团体众多,内容也庞杂各异,民间社会团体和政府机关均有参与。一般认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以民间知识分子晏阳初和梁漱溟所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分别在河北定县从事的“定县实验”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含菏泽)从事的“邹平实验”最有影响,他们的工作内容和成绩也较具代表性。<sup>[1]</sup>与此同时,梁漱溟和晏阳初及其领导的乡建团体与具体工作也成为了批判者的众矢之的。<sup>[2]</sup>

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此二者的批判立论大异其趣,但在某些“细微”之处又略有所同。左派知识分子与乡建运动者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农村破坏的根源问题,前者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认为此为造成农村崩溃的根本造因;乡建运动合道性的根本前提是深刻认识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在被批判者一方,若姑且将从事乡村建设各团体视为同一阵营,则该“阵营”内部乃至同一团体中又往往存有颇多歧见,而且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对立明显。

## 一、从“乡村崩溃”到“乡村建设”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外力的进入和中西冲撞的加剧,中国乡

---

[1] 陈序经曾注意到:“近来有好多人,一谈起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往往就会联想到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而一谈到这个运动的实验工作,又会联想到晏阳初先生所指导之下的定县工作。”见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1946年,第88页。

[2] 乡村建设批判者之一的薛暮桥就回忆说,“乡村建设批判”的对象就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直处于新旧更替、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国内政局的持续激荡，更是直接导致了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凸显。

更严重的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代后，时人眼中的农村危机和农民痛苦已是日甚一日。梁漱溟曾说，“乡村一天一天破坏，在农工生产者虽感痛苦，因无知识，不能说话。知识分子虽有说话资格，而未易感觉若何切肤痛苦”，所以“乡村尽管破坏，却从来不闻人呼痛，亦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到最近年农村经济大崩溃，实达于此破坏史的最后阶段；好比利刃直刺到命根上，到底不能不痛，这才呼声四起。”<sup>〔1〕</sup>

梁漱溟的这一观察大致不错。农村的经济衰败和社会失序，确已成为当时知识界极为关注的共同话题。1933—1935年，《独立评论》上刊载了许多反映农村危机相关问题的文章，农村破产“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呼声”。<sup>〔2〕</sup>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赵人儁在1933年就看到：“沿江海的省份，近城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年年缩减，生活年年困苦。内地的省份，偏远的乡村，……数十户的村落，或至人烟绝灭，数百户的农村，或只余十数，……目今日农民的忍耐性，已迫近最终点，将有爆发之虞。”<sup>〔3〕</sup>不仅如此，在一些返乡知识分子的眼里，如今家乡农村的衰败景象与昔年的美好回忆往往大相径庭。一位署名为董浩的知识分子，回到家乡河北省大城县住了一个多月，“所见到的是贫穷，紊乱，人民生活的颓废，知识的浅陋；所听到的破败，分家，土匪等等，不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9年，第359页。

〔2〕 关玉润：《农村经济一夕谈》，《独立评论》第132号，1934年12月23日，第11页。

〔3〕 守愚（赵人儁）：《复兴农村与农民负担》，《独立评论》第66号，1933年9月3日，第4—5页。